理论与实践

理论宣讲要有『抬头率』，更要追求『点头率』

■ 代玉启

走亲宣讲作为浙江基层理论宣讲创新的实践样本，脱胎于中国乡土社会的“走亲”民俗。2015年，湖州市率先打破县域宣讲壁垒，通过区县互访交流，将“走亲戚”的情感纽带与理论传播相结合，形成了市域内“理论走亲”的初步机制。随着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使命的推进，走亲宣讲被赋予更深层的治理意义，原有市域“内循环”逐步升级为跨省域“外循环”，理论传播也在不同地方的密切互动中不断走深走实。

“八八战略”为什么行？“千万工程”具体怎么实施？绿水青山究竟是如何转变成金山银山的？当“有形”物质政策帮扶和“无形”理论经验帮扶相叠加，理论宣讲的“藤蔓”便跨越山海，在田间地头、村社广场生根发芽，激活新时代理论传播的一池春水。

走亲宣讲“谁来讲”？青年群体既是理论传播的“生力军”，也是形式创新的“先锋队”。走亲宣讲注重团结青年，创新打造情景式、开放麦等青春化宣讲形式，有效跨越话语代沟，实现“声”入人心的效果。

走亲宣讲“怎么讲”？金杯银杯不如听众的口碑。相较于传统宣讲的宏观或中观叙事，走亲宣讲更聚焦微观表达，注重提升地方味和故事性，以小切口投射大时代，以常情常理激荡人心。

一是以“走”的行动拓展理论传播空间场域。走亲宣讲，首要在“走”。“走”的行动打破了传统宣讲的“中心-边缘”结构，其意义不限于物理空间的位移。一方面，走亲宣讲推动理论触角的延伸，以“流动讲台”为载体，将抽象理论与具体生产生活场景相结合，使听众在熟悉的环境中产生认知共鸣，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走亲宣讲注重扎根一线，通过“送课上门”的形式，建立周期性政策理论学习互动机制，切实拉近宣讲者与听众的心理距离。随着走亲宣讲的实践深入，从工厂车间的生产场景到青砖院落的共富对话，从阡陌田间的思想碰撞到社区书房的集体叙事，理论文本从封闭走向开放，理论传播从单向传递变为双向交互，宣讲场域从固定讲台走向生活现场，构建起“去中心化”的网状空间，形成可感知、可参与的“内化-外化”动态过程，充分激活受众的“场景记忆”与“经验图式”。

二是以“讲”的提质优化理论传播叙事逻辑。理论宣讲走“新”更要走“心”，“讲”的提质增效是关键。“走亲”打破了传统宣讲中“台上台下”“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模式，通过重构叙事逻辑，推动理论传播实现深层转化，促使受众从被动接受“他者话语”转向“自我建构”。通过构建双向互动、平等对话的场域，既能激发宣讲者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内生动力，实现“育人自育”，又能重塑教与学的关系，破解传统宣讲中的“理论悬浮”困境。通过“用群众的语言说话”，领悟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智慧，让理论宣讲变“独奏”为“合奏”，从“一个人”走向“一群人”。

三是以“亲”的内核探寻理论生命力。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走亲宣讲何以可能？“走出去送经验”并非机械复制，而是通过“理论在地化”完成差异场景中的创造性转化；“引进来取真经”也并非生硬嫁接，而是推动用地方实践智慧诠释理论体系，进而反哺理论体系，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走亲宣讲通过跨区域的思想碰撞与实践对话，让局部探索升格成普遍方案和区域协作的立体网络，超越了“授人以鱼”的物质帮扶局限。通过构建“知-信-行”的价值共同体，党的创新理论也就能更加深度地嵌入地方社会的实践网络。

走亲宣讲的实践创新，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对“两个结合”的微观呈现：既赓续了传统习俗的文化基因，以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依托，重塑理论传播的伦理情境；又践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精髓，将“从群众中来”的经验升华为“到群众中去”的实践智慧。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走亲宣讲”正是通过“走-讲-亲”的实践链条，将这一理论逻辑具象化为基层治理的创新范式。

理论宣讲要有“抬头率”，更要追求“点头率”。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走”拓展了理论传播的物理与精神场域，“讲”重构了理论教育的表达与接受逻辑，“亲”则锚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共生关系。在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真理力量与情感能量的辩证统一中，走亲宣讲为新时代理论武装提供了“守正创新”的鲜活样本和方法论启示，绘就了理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图景。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践行“两山”理念 促进城乡共富

■ 沈满洪

理论热点面对面

8月15日是第三个全国生态日，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的日子。20年来，“两山”理念不断发展和延伸，拓展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等科学论述，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践行“两山”理念，不仅需要对其思想精髓有准确认识，还需要清晰把握实践途径，通畅青年参与渠道。

准确认识“两山”理念的思想精髓

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的2005年、2013年等一系列相关论述可知，“两山”理念是一个理论体系：

一是统筹兼顾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这既是对“只要经济增长，不要环境保护”的传统经济增长观的批判和超越，又是对“只要环境保护，不要经济增长”的狭隘环保主义保护观的批判和超越，“两山”理念充分认识到了绿色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制度的巨大威力。

二是生态优先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坚持统筹兼顾论；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要坚持生态优先论。这是对工业化进程中一度出现的“宁要经济增长，不要环境保护”的错误观点和做法的严肃批判，并基于此树立起关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关系的科学论断。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不可突破“生态阈值”。

三是绿色发展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方面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即经济生态化；另一方面要推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即生态经济化。

把“两山”理念转化为指导具体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其思想精髓就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建共享”：

第一，坚持生态优先，做大“绿水青山”。经济系统其实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自然可以不依赖人类而存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则离不开自然。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甚至敬畏自然。

第二，坚持绿色发展，做高“金山银山”。“两山”理念绝不是不要发展，更不是不要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也是强调绿色发展。新发展理念包含“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是“两山”理念的本质要求。

第三，坚持共建共享，促进生态共富。践行“两山”理念，事关生态文化的引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资源的利用、生态产业的发展、生态消费的养成、生态人居的营造、生态科技的创新、生态制度的建设等方方面面，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共同富裕，生态共富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绿水青山”就其生态功能而言是最普惠的，生态环境面前人人平等；“绿水青山”就其经济功能而言，是可以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经济共富的。

清晰把握“两山”理念的实践途径

准确认识“两山”理念的思想精髓，有助于清晰把握其实践途径：

生态保护的实践途径。要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要像保护眼睛和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生态保护必须构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治理格局。还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循环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GDP的自然资源的消耗量、污染物的排放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均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当然，我国还处于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多重任务叠加的时期，生态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 绿色发展是“两山”理念的本质要求。生态共富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绿水青山”就其生态功能而言是最普惠的，生态环境面前人人平等；“绿水青山”就其经济功能而言，是可以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经济共富的。

绿色发展的实践途径。绿色发展是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有机结合，经济生态化要求实现从“经济不绿色”向“绿色且经济”的转变、从“经济不低碳”向“低碳且经济”的转变、从“经济不循环”向“循环且经济”的转变。传统发展方式往往存在路径依赖，没有壮士断腕、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精神和勇气是难以实现绿色转型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以绿色革命精神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生态经济化则是将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生态产品等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生态优势的利用离不开生态补偿、循环补助、低碳补贴等财政政策的支持，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已经形成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的结合、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的结合、输血型补偿与造血型补偿的结合，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比如，我国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通过低碳补贴实现了低碳能源从“低碳不经济”到“低碳且经济”的华丽转型。但是，绿色财政补贴政策只是校正市场失灵的辅助手段，实现生态经济化的根本途径不是绿色财政补贴，而是发展生态经济。

共建共享的实践途径。无论是“生态优先”还是“绿色发展”，都是每个个体的事情，必须走最广泛的群众路线，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还必须走“生态共享，人人有福”“生态共富，人人有福”的生态共富之路。

高度重视践行“两山”理念的青年参与

党中央已经擘画了一幅宏伟蓝图：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的十年到二三十年，正是当代青年风华正茂之时，以美丽中国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正是他们。广大青年尤其是环境治理的监管者和绿色经济的从业者、管理者，如何继续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呢？

做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必须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我做起，从家庭做起。生态文明战略的谋划、生态文明制度的设计、生态文明规划的编制等，也离不开在一线岗位锻炼得日渐成熟的广大青年的参与，要积极参与到相关论证会、听证会、征求意见会等活动中。还要构建起政府、企业和公众多方协作、相互监督的生态治理格局，广大青年在参与对政府和企业生态环境行为的监督上也大有可为。

做绿色经济的建设者。绿色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绿色科技创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要解决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生态产品的保护和利用等问题，当代青年要勇于投身绿色科技革命的潮流，作出绿色发展的中国贡献。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以绿色为底色的创业，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推动绿色发展。资源环境要素的配置既离不开管理者，也离不开企业家，对于环境治理和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尤其是担负一定管理角色的青年管理者而言，更要勇敢投身绿色经济的发展实践并大展拳脚积极作为。

做生态共富的参与者。随着一定比例的青年在环境治理领域逐步成长并担负起一定监管责任，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成为绿色经济的从业者甚至企业家、管理者，他们在践行“两山”理念、实现生态共富方面，有望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创新一次分配制度。加强土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用水权、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产权制度的变革，增加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居民的资产性收入。创新二次分配制度。通过生态补偿、循环补助、低碳补贴等绿色财政支出政策和资源税、环境税、碳税等绿色财政收入政策，调整不同人群的收入结构。创新三次分配制度。大力发展生态公益事业，推广生态志愿者活动，筹建生态慈善基金，让生态慈善事业大放异彩。

【作者系浙江农林大学党委原书记，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本文系“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研究”（BIA230169）阶段性成果】

学者看法

组合式财税政策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 詹新宇 刘文彬

>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财税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政府应根据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有区别地选择创新支持政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当前正处于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而科技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还强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进程中，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然而，由于创新具有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不少企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亟须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企业科技创新面临的主要困难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不会创新”。早期，我国企业创新主要表现为针对发达国家的跟随创新和模仿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面临“卡脖子”难题。现阶段，科技创新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前沿领域进军，这迫切要求企业在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革命性突破。然而，目前不少企业在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等方面均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这导致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企业科技创新成本较高，“不能创新”。一是企业自主研发成本较高。以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中小企业为例，目前公开可查询数据显示，其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比重达到38.6%。而且，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将进一步提高企业在高素质人才、高科技设备等方面的创新投入成本。二是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成本较高。在取得研发成果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的过程中，企业往往受制于融资约束而缺乏创新动力。

企业科技创新风险较高，“不敢创新”。一方面，企业研发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较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前沿领域，企业科技创新进入到模仿对象缺失的“无人区”。另一方面，企业科技创新市场风险较高。一项创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往往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新质生产力的前沿领域尤其如此。这会导致企业对创新回报的预期不足，因此会谨慎选择是否进行科技创新。

组合式财税政策助力企业科技创新的有效性

我国政府通过实施多种创新支持政策助力企业科技创新。其中，以减税和补贴为主的供给侧政策旨在降低企业创新的投入成本，而以政府采购为主的需求侧政策则重在降低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当然，还需要关注不同财税政策的组合或搭配。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的组合式财税政策能够很好地弥补单侧创新支持政策的不足，从而产生“1+1>2”的政策协同效果。

组合式财税政策能够作用于企业创新全过程。以补贴和减税为主的供给侧政策主要作用于企业技术开发环节，而以政府采购为主的需求侧政策则更有利于降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风险。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的组合式财税政策能够在企业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共同发力，全方位促进企业科技创新。

组合式财税政策有利于发挥制度协同效应。政府采购具有透明、公开和公平等特征，如果与补贴和减税等供给侧政策组合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供给侧政策存在的制度漏洞，提高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效率。

组合式财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以创新成果为导向的需求侧政府采购政策明显具有更强的指向性，有利于更加直接地引导企业创新的前进方向，尤其是在存在更大不确定性的科技前沿领域。政府采购政策还能通过加强用户（政府）与生产者（企业）之间的信息互动和资源要素共享，降低企业研发创新的不确定性。

组合式财税政策助力企业科技创新的具体举措

企业自身的禀赋特质将影响财税政策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效果。其中，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是决定企业是否参与创新的关键因素，而这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紧密相关。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财税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政府应根据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有区别地选择创新支持政策。

对于初创期企业，根据行业属性进行适度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初创期企业的主要目标在于“求生存”，施行政府补贴政策时应谨慎挑选补贴对象、完善财政补贴机制。一定的税收减免也有利于降低初创企业的成本和负担，缓解其资金约束，提高初创期企业存活率。

对于成长期企业，以财政补贴为主、税收优惠与政府采购为辅。成长期企业的主要目标在于“谋发展”，一定的财政补贴能够缓解成长期企业的融资约束，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适度的政府创新采购也有利于降低企业创新的市场风险，助力企业成长。但成长期企业往往因利润不足而较少受益于以所得税优惠为主的税收激励政策，因此，应尽快完善流转税税收优惠政策，提高税收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

对于成熟期企业，以政府采购为主、税收优惠为辅，财政补贴政策逐步退出。成熟期企业一般已经具备了稳定的盈利能力，也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但它们承担创新风险的意愿相较于前一阶段往往有所降低。此时财税政策的施策重点，应放在降低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政府创新采购政策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对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同时，成熟期企业往往拥有稳定的利润和良好的市场声誉，此时财政补贴政策应该逐步退出。

对于衰退期企业，根据行业属性和企业特质进行适度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与初创期企业类似，衰退期企业又重新进入到“求生存”阶段，适度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其创新成本，延长衰退期企业的存活时间。但与初创期企业不同的是，一部分衰退期企业可能不愿意承担再次创新的风险；也有一部分可能具备较强的发展动机，在“死亡威胁”下反而会更积极地参与科技创新，以求顺利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因此，政府在对衰退期企业进行政策支持时，应谨慎挑选施策对象，完善政策机制设计，切实提高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和激励作用。

（作者詹新宇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特聘教授、博导；刘文彬系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

把基层治理平台的“含金量”转化为城市治理的高质量

■ 吴 涛

> 充分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引导和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有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指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完善基层治理平台建设，要让基层一线与老百姓贴近更要贴心，努力实现矛盾纠纷就地解决、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就近满足，让社会治理更有人情味，努力把基层治理平台的“含金量”转化为城市治理的高质量。

以党建引领打破治理壁垒，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治理体系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提升基层治理质效的关键。要以区域党建实现条块合作，以柔性党建提高组织结构弹性，夯实基层党组织力量、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鼓励基层治理创新。以党组织引领吸纳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实现治理主体的一核多元。通过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感召带动群众，将党的价值目标内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使命型政党的价值目标融入基层治理之中，以自治德治法治相融合的方式实现共同的善治目标。及时总结推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案例式操作规范，让更多基层工作人员愿做、会做群众工作。

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形成“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多元治理格局。牢固树立“全周期管理”理念，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治理全领域、各环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不断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破解基层治理平台建设“过大”或“过小”的现实困境，坚持在“生活圈”“服务圈”“工作圈”的搭建和完善中不断织密城市主体间链接网络，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以队伍建设强化担当作为，筑牢基层治理平台建设的“基本盘”

基层治理平台的队伍建设，是畅通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最后一米”的关键因素。要加强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强化居村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共情能力、引领能力、专业能力、协商能力，让社区工作者“工作有盼头”“进阶有通道”。

要加强规范化的志愿服务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激励和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普遍建立志愿服务人才储备库。培育常态化的社会治理新生力量。充分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引导和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自上而下的机关化评价”向“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转变，引导基层把工作重心转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上来。

以信息化支撑加持治理能力，共享基层治理平台的数字红利

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层治理平台的建设带来重要契机。信息化支撑带来的集成性可以将不同资源有效联结起来，有效调动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并形成更加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可溯性有利于解决由于权责不清带来的互相推诿、扯皮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各层级和职能部门的协作性；快捷性有利于及时反馈和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克服碎片化治理带来的问题拖沓久而不决。充分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以信息化、智能化倒逼基层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治理流程的再造，促进基层治理体系的协同性和整体性变革。

打造服务全域治理的基层治理信息平台，推动资源整合、力量融合、人机耦合，努力以民意感知在早在小推动矛盾化解在早在小。把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起来，打造智能化和现代化新型治理模式以及全要素基层治理“最强大脑”，为基层全域网格化治理提供技术支撑与要素保障。

统筹建设社会综合治理平台等智慧系统，将基层社区的智慧信息治理平台和居民普遍使用的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结合起来，以整合多层级信息，推动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间的数字化协作创新。完善数字信息平台，持续发挥区级城运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大数据中心作用，提高向基层一线科技赋能效率。打造标杆应用场景，面向基层开发更多“高效办好一件事”“高效处置一件事”的应用场景。及时回应治理需求，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以法治保障守护幸福安宁，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基层治理平台的法治化，需要夯实基层治理法治底座，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持续推动“法治元素”转化为“发展要素”。

要加强基层自治规则的供给和自给，针对基层自治中的盲点或模糊之处，出台地方性规则。比如，可就社区加装电梯时如何在尊重多数业主意愿的同时，合理兼顾一楼业主等的利益，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规则。推动各社区依法形成符合实际、居民认可、落地有效的自治规约等。支持业委会代表业主与物业共同优化相关合同、协议，提升物业服务的规范性。赋能与规制并举，保障依规则自治，完善由居委会指导、业委会监督、物业企业执行的三方联动处理机制。

还要充实对基层自治的法律服务保障，升级村居法律顾问为片区内“轮换+预约”相结合的模式，街镇按片区统筹安排不同专长的律师，按需匹配。扩大招募由热心公益的高校法科生、律师、公检法司退休人员等组成法律志愿者队伍。推动文化与技术的数字化融合，使群众感受到数字治理的“温度”，推进信息安全监管高效化，把事情干好、干快、干成，切实守护群众的幸福安宁。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基层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